

内江市
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四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本辑编审:刘庆声
责任编辑:王德润
校 对:王况 温余波 蒋政伦
封面设计:刘庆声
封面篆印:李文馥

内江市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四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字数14万 印数600册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教育印刷厂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图书准印证:内江市(96)字第092号

目 录

难忘的时刻 深切的怀念

- 忆朱德委员长来内江椑木公社召开调查会情景
..... 夏慕廉 杨华贵 (1)
- 范长江西北行之探讨 黄剑庆 (7)
- 难忘的岁月 向汝君 (26)
-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 余浓治 (口述) 王德润 (整理) (29)
- 回忆参加革命的历程 张星石 (39)

- 略谈公孙长子的书品与人品 罗仁忠 (50)
- 尧文藻老先生画传初稿 梅晓初 (忆述) 德润 (笔录) (59)
- 内江市曲剧团始末 (三) 蒋政伦 (72)

- 内江市桥牌发展概况 王志鳌 (87)

内江专区篮球队在省第二届运动会中

- 忆专区体委主任窦尚初司令员 张远在 (97)
- 内江群众体育活动的兴起
- 记困难时期第一场篮球比赛 朱德彬 (102)

- 赵贞吉与严嵩迂回曲折的斗争 曾孔恕 (104)

- 医师陈伯勋轶事 陈伯勋（口述）蒋政伦（整理）(111)
轶闻琐记 直公（文）王德润（整理）(115)
- 内水阳秋（二） 洪若 (124)
话活源井和我的家 张崇瀛 (129)
内江城垣的兴废 叶自明 (136)
内江城垣耳城轶闻 任世俊 (146)
大洲坝的变迁 黄海鸥 (148)
友好路与文英街 拙老、梅老（口述）王德润（整理）(154)
内江的第一辆汽车 宋子麟（口述）德润（笔录）(156)
- 消息一则 (164)
- 痛悼范增源、谢嘉猷、傅长楠三老逝世
刘庆声、官简贤、梅英、张星石、吴伯涵等 (157)
- 更正小启 (164)
- 尧文藻 山水画（封三） 蒋政伦供稿

难忘的时刻 深切的怀念

——忆朱德委员长来内江椑木公社召开调查会情景

夏慕廉 杨华贵

编者按：今年，是全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委员长诞辰110周年；

他老人家来内江椑木公社二大队召开调查会35周年；又是他老人家离去我们20周年的纪念日。值此，当年曾参加调查会的椑木公社党委书记夏慕廉、市农工部副部长杨华贵追忆起当时动人情景，犹似昨日，历历在目，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为此，我们特邀该两同志记录成文，以寄内江人民对朱德委员长无限深切的怀念。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75岁高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朱德同志不顾年迈，遵循毛泽东主席在全会结束时总结讲话提出的“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的精神，率先到全国各地的各条战线，深入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

1961年4月17日，内江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朱德委员长及其夫人康克清同志等一行，在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省统战部长程子健、宜宾地委书记牟海秀等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隆昌气矿之后，乘火车专列于下午二时到达内江椑木境内的金紫桥成渝铁路与公路平交道口，然后改坐内江地委派去的小车到了椑木公社二大队大队部公路旁。

朱德委员长身着便装，手执拐杖健步走过了一段田坎土埂的小路，来到大队部（小地名堰坎）院坝内，召开直接听取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意见的调查会。参加调查会的有：椑木公社党委书记夏慕廉、社长李富成、二大队支书龚和清、大队长曾少荣、二生产队队长陈金山、食堂事务长廖福仙（女）以及该队的十余名社员代表，加上省、地、市负责同志廖志高、程子健、牟海秀、刘海泉（原内江地委代书记）钱善积（原内江市委书记）共30余人。朱德委员长在公路旁下车时，便叫随行人员拿出一个小本子，递去前来迎接他的杨华贵，吩咐将参加调查会的地、市、社、队干部的名字写在小本子上。当时二大队的条件较差，大队部没有会议室（当然什么茶具等物都没有）调查会只能安排在大队办公室门前的大晒坝里，冒着太阳举行。大家围坐的是高板凳（朱德委员长也没例外）喝的是用的大粗碗装的白开水（一片茶叶也没有，想起来实在有点寒酸）。地、市、社、队的领导都感到有点内疚，朱德委员长却乐呵呵的，他诙谐地说：“这很好嘛，空气又新鲜，又能晒太阳。”他老人家坐在一张高板凳上，拿出小本子，一一呼唤，一个一个地认识地、市、社、队干部后，叫刘海泉同志坐在

他的左边，又叫夏慕廉同志坐在他的右边。待参加调查会的人员围成圆形坐好后，用浓厚的四川乡音首先问夏慕廉：“公社化后，你们场上的木器、铁器等手工业是由公社统一核算，还是单独核算？是不是自负盈亏？”当时夏在思想上有个“一大二公”的框框，汇报了些组织规模大、集体化程度高，公社统一核算的“好处”后，继续说：“公社化后，我们就搞成了公社统一核算，原来的手工业社都改成厂了；现在有铁工厂、木器厂、制面厂、综合厂等。”朱德委员长听后，沉思了片刻自问自答地说：“像你们这样由公社统一核算，能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可能有影响吧？恐怕还是让他们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更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吧！”接着，他老人家又问夏：“现在农村的石匠、木匠、泥水匠，能不能单独出去做工？”

“五匠自由出去揽活干，我们认为不符合集体主义精神，会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影响农业生产。不经公社、大队的同意是不准许他们单独外出找活干的。”夏作了如实的回答。

朱德委员长听了笑了笑，语重心长地说：“在四川，手工业有历史传统，从这个特点出发，要注意发展多种经营和手工业。”紧接着又问夏：“现在椑木镇赶场的人多不多？有没有人坐茶馆喝盖碗茶？”

“公社化后，按市里的规定取消了逢场。只是在公社统一安排下，农闲时社员十天里放假一天，农忙时半个月或二十天中放假一天。放假中，还是有些社员要赶场。不过赶场也没有什么买的或卖的。茶馆早就取消了，赶场人也没有坐茶馆的了。”

“那些提炊壶的人做啥子呢？生活怎么办？”

“他们在街上没有事做，我们动员他们到农村去搞生产了。”
(当时动员了一批城镇人员下乡)

“镇上的饭馆还多不多？有‘冒儿头’（饭）卖没有？烧酒、油炸粑那些东西还有没有卖？”

“饭店还有几家，都不卖‘冒儿头’了。现在饭馆卖饭都称重量，吃几两粮就称几两粮的饭。烧酒、油炸粑没得卖的了。”

这天下午气温很高。这时，朱德委员长头额上已溢出不少汗珠，热得他站起身来脱下了外边穿的半新旧的中山服，现出一件领上已发毛的旧白布衬衫。坐在他老人家身旁的夏慕廉，十分过意不去，便叫旁边坐的卜有伦（公社手工业负责人）拿来一柄大布伞，撑起想替他老人家遮遮头上的红火大太阳。谁料他老人家竟站起身来，推着卜的手说：“大家都在晒太阳，不必为我个人打伞，大家都一样嘛！晒晒太阳也有好处。”朱德委员长执意不肯为他个人撑伞，这件极平凡的小事给人们留下了极不平凡的印象。就在这普普通通的小事中，愈加显示出朱德委员长伟大崇高的形象。

当朱德委员长推开卜撑的伞坐下后，转向二生产队食堂事务长廖福仙，问道：“你们食堂一天吃几顿？每人一年吃多少粮？”

“我们食堂一天吃两顿，按上面规定每人一年吃360斤原粮。”廖福仙刚回答到这里，二生产队队长陈金山把话头接过去非常激动地说：“一人一天吃一斤原粮，哪个吃得饱？”他边说边解开衣服指着自己贴了几张膏药的身上继续说：“粮食不够吃，喊瓜菜代。你们看嘛，吃些瓜瓜菜菜，我都瘦得皮包骨头了，毛病也整起了。”说完，他回过头，见有的人用惊异的眼光盯着他，他才勉强地笑了笑，补了一句道：“各位领导莫见怪，我们农民爱说老实话。”

听了陈金山的一番话后，朱德委员长点了点头，开导地说：“现在粮食不够吃，生活困难是暂时的。你们没有去过国外，我到过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哪个国家都没有我们国家的蔬菜多，我们四川的蔬菜更丰富。”他顺手指着屋侧的一块窝笋土，“你们看，那窝笋就是一种好菜。我小时候在家里，一年四季差不多都是在糊糊里面加些瓜瓜菜菜当饭吃，身体长得还好。粮食是需要吃，但也要多吃些蔬菜。现在我每天只吃几两粮，当然我比你们吃得好一点，每天有一、二个鸡蛋。多吃瓜菜眼睛有好处，我从小就喜

欢吃瓜菜，你们看，我这么大的年纪了，看什么东西，还可以不戴眼镜。”康克清同志插话说：“蔬菜的营养是很好的。”朱德委员长继续说：“在国外，有的国家蔬菜比肉还贵嘞！”尔后，他老人家又关心地问陈金山“你们现在是哪个种庄稼的？种些啥子？怎样才能增产啊？”

陈金山对一度出现的瞎指挥很有意见，带有几分牢骚地回答说：“我们现在种庄稼全是听上面的安排，上面叫哪个种就哪个种，我们当农民搞了一辈子还种不来庄稼了！”陈一边说一边指着对面山顶上的麦子土，“你们看嘛，山顶上种的麦子，苗架都长不起来，产量会有好高？哪个都晓得山顶上土质瘦薄，种麦子哪个得行？按我们生产队的主张，山顶就该种豌豆、葫豆，才会有好收成。”

朱德委员长听了陈金山的回答。环视了一下身边的省、地、市领导笑了笑告诫地说：“种庄稼他们很懂嘛，情况也熟悉。种什么能增产，他们最有发言权，哪块土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朱德委员长的目光又停在陈金山身上：“你们不要管上面那一套，你们认为该怎样种能增产就怎样种嘛。”他老人家最后还一再鼓励大家要克服当前困难，要搞好生产，要搞好群众生活……

调查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过。结束时，朱德委员长与到会的干部、社员们一一握手，当他老人家握住陈金山的手时，继续鼓励说：“你很有生产经验，好好地干。”当时，参加调查会的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只知道是中央、省里的干部还不知道来和自己摆龙门阵的就是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当他老人家走近廖福仙身前与廖握手时，廖才惊奇的发现是朱德委员长，不由高声地喊出：“啊，朱总司令！”此时，参会的队干部和社员代表都不约而同的高喊“朱总司令！”顿时一片欢腾……

后来社员、干部把见到自己敬爱的朱总司令当着终身幸福。

朱德委员长对这次调查会非常满意，他回到谢家坝招待所（内江军分区招待所）向刘海泉等同志赞扬说：“这个会开得好，你

们没有搞消息封锁，我听到了大家很多的心里话，了解到不少真东西。”

朱德委员长亲自到内江椑木公社二大队召开调查会，全面地调查询问当地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的情景，虽然时过35个春秋，今天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他老人家在调查会上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中。特别是他老人家那种平易近人、慈祥宽厚、和蔼可亲的待人态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鼓励人们、讲老实话、办老实事的求是精神；关心生产发展、了解人民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伟大胸怀；生活简朴、轻车俭从、不讲排场、不摆阔气，与人民同甘共苦的高贵品质，都令我们无限的敬仰和钦佩。现在追忆起当时的情景，深深感到朱德委员长的崇高品格，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

他老人家虽然离开我们已20个年头了，我们将永远怀念他老人家……

范长江西北行之探讨

黄剑庆

1935年夏，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由北平到成都后，赴西北考察，历时十个月，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通讯报道，陆续发表在《大公报》上，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这些通讯作品汇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后，更是受到读者的欢迎，一连出了数版，“销行之广，为空前所未有。”^①那么，他为什么要去西北呢？目的是什么？他具体到过哪些地方？所写通讯作品有哪些方面的内容？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范长江西北行成因及其目的

范长江产生去西北考察的思想，当上逆到1933年。

1933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山海关，震惊了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的范长江，深感：“从读书中找中国出路的方针，行不通了。”^②他走出书斋，参加了“辽吉黑热抗日义勇军后援会”的工作，后又与北大同学组织了“北大学生长城各口抗日将士慰问团”，到长城各口慰问抗日士兵。他在这些社会活动中，了解到一些关于战争方面的情况，从而开始了对抗日问题的研究，并与一部分同学成立了“1936年研究会”，意为世界局势风云日紧，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估计在1936年爆发。研究会因诸方面的原因，活动开展不正常，范长江参加过几次会后，就撤出来自己进

① 1937年1月6日《大公报》。

② 范长江《我的自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范长江新闻文集》下卷，第1109页。

行研究工作。他通过对抗日军事问题的研究“认为抗战爆发之后，沿海一带不可能久守，抗战大后方将在中国的西部（西北和西南）。①”

范长江这一观点，与当时和他情形类似的青年朋友的认识一致，他们曾在一起探讨过未来抗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过以下意见。

“第一，战争初起时，由于敌人军事力量的优势，沿海沿江及东部平原地区我们事实上无法防守，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暂时放弃。

“第二，中国战争为主要战线，将是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地分野地区，只有依托山地，才能减少敌人的优点和发挥我们的特点。

“第三，我们将来的中心是四川。只有四川才是最安全的抗战司令塔，只有四川才能联络西北和西南，也只有四川才有支持抗战的富厚经济力量。

“第四，我们应当准备放弃沿海对外交通线，而且在西北、西南及西方另建国际交通线。

“第五，战争爆发，沿江沿海的生产，必然丧失，应在西部中国，另建经济中心。

“第六，准备以西部中国的人力物力与东来的敌人长期战争。②”

为此，范长江曾与青年朋友发起组织“中国青年西部考察团”，计划组织三个分团，分赴西南、西北及川康考察，拟通过考察的结果来证实与充实他们的上述意见。为了实现去西部考察的计划，争取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援助。1933年冬，他们在南京《新民报》、《新京日报》上，发表了“中国青年西部考察团”的宣言，说：“兹有范希天（范长江原名）等鉴于国际风云日紧，第二

① 范长江《我的青年时代》《人物》1980年第3辑。

② 范长江《祖国十年》香港《华商报》1941年10月14日。

次世界大战迫在目前，我中华民族今后之命运，以此大战之结果为决定之枢机。我中国青年若不于此千钧一发存亡旦夕之际各尽其心力，从各方面致力于未来国际之准备，以应付未来之大战，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非但我中华民族，而且东西各被压迫民族亦将益陷于不可思议之悲境。”“范君等深信，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之国际计划，因就战术之进展，沿海及中原各地皆失其军事政治中心区域之价值，不足以解放战争之根据地。而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之西部各省，始为我民族复兴之昂哥拉。”“故特约集青年同志自发组织‘中国青年西部考察团’前往中国西部作国防性质之考察。^①”

这一计划由于没得到多少人的响应，“先后来报名的只是七个有游历兴趣而无经济负担能力的青年！^②”计划就此落空。

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范长江在当时的抗日军事思想，也不难看出他前往西部考察的一些基本思路。但这只是促成他西北行的原因之一，而最终促成他西北行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对红军的研究。

范长江在研究抗日军事问题的同时，也注意到江西中央苏区和红军的情况。他从天津《国闻周报》连载的几期关于“赤区土地问题”的专栏文章中，看到了江西苏维埃政府的一些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以及有关土地革命的文件。“说明苏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绝不是国民党所宣传的‘土匪’、‘流寇’^③”之词所能代替的。这时，他听说江西红军主张“联合抗日”，并发出了通电，使他想进一步了解苏区和红军。为此，他于1934年春到了江西南昌，并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三个月。

范长江在南昌，通过一位在南昌行营做事的同乡，搜集阅读

① 引自范东升《当他还是一个名记者的时候》、《新闻记者》1984年第4期

② 范长江《祖国十年》香港《华商报》1941年10月14日。

③ 范长江《我的青年时代》《人物》1980年第3辑。

了大批中央苏区和红军油印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有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文件，有中央党部到地方党部的文件，各级军队用的文件更是非常丰富。^①”范长江从中了解到许多关于中央苏区的情况，如抗日问题，“九·一八”后，中央苏区的文件即“指出‘民族危机’，指出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不是对哪一个阶级的问题，而是对中国各阶层的威胁。”并“提出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②”的主张。这些，范长江虽然晚读到两三年，仍使他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积极抗日的主张。

范长江从这些小册子中还了解到“原来红军在江西打了许多大胜仗，并不像国民党所宣传的取得了所谓‘剿匪胜利’。”而且，“红军组织得极好，是很好的军队。^③”关于土地革命问题，他看到了比《国闻周报》所见到的更多的材料，认为苏区的做法是对的，符合他所知道的农村情况。但也有他未弄清、不明白的问题。如有的文件认为，日本进攻中国的目的是进攻苏联，因此要“武装保卫苏联”，还有许多文件标明“根据国际指示”如何如何等，他对此想不通。“第三国际隔中国那样远，中国革命如何能事事听它指挥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民党已腐化堕落，共产党在认真革命，但在当时情况下，要抗日，只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没有其它出路。^④”至于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他还看不出门路，他准备继续研究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把那些还不明白的问题搞清楚。但此时正值国民党蒋介石调集数以百万计的兵力向中央苏区进行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他进不了苏区，只好“怀着这种想法回到北平。”

① 范长江《祖国十年》香港《华商报》1941年10月17日
② 范长江《我的青年时代》《人物》1980年第3辑
③ 范长江《我的自述》《范长江新闻文集》下卷，第1113页。
④ 范长江《我的自述》《范长江新闻文集》下卷，第1113页。

范长江回到北平，一方面开始以写稿为生，先后担任北平《晨报》，天津《益世报》、《大公报》通讯员；另一方面继续进行抗日问题研究，搞一些具体的社会、人生问题的研究。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战略转移——长征。范长江不知道详情，但他听说红军要北上抗日，感到这是一件大事。1935年春，红军部队进入四川西部，北上抗日得到证实，他尤为迫切地想了解这一情况，继续他在南昌未完成的工作，同时实现到西部考察的愿望。怎样才能去呢？他一时想不出办法。因为他既无名又无地位，更没有足够的旅费，要想去大西部，谈何容易。这时，《大公报》陆续发表了画家赵望云的旅行写生通讯。他想，如果能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到西部的事情就好办了。尤其是《大公报》在全国声望颇高，在各地建有分支机构可以依靠，对他十分有利。因此，他向《大公报》社提出了去西南西北旅行考察的计划，说明为报纸写通讯，文责自负，不要差旅费和工资，只要一个名义和付给稿酬就行了。报社同意了他的计划，聘他为特约通讯员。1935年4月底，范长江即到天津，5月初由天津启程，经烟台、上海等地绕道，逆长江入四川。7月14日随一支小部队离开成都，正式踏上著名的西北之行。其间，范长江曾打算直接到红军中去，他在《我的自述》中谈到这一情况，说：“我大概是1935年五、六月到成都的，我决定首先直入红军。这时红军主力在四川西北部，暂时没有前进（以后才知道这时正是张国焘闹分裂的时候，这是我到延安才知道的）。我一个人就由成都北上，由彭县入大山，雇人带行李，越走山越大，人家越少，深山密木，道路曲折，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只想能撞见红军。沿途群众见我不是本地人，单身进大山，又无目的地，都劝我不要前进，因为山中土匪很多（这里不是说的红军，而是指真正的土匪），野兽也不少。我没有办法，只好回成都。在我写的‘成兰纪行’上简单地写过这一段，但没有谈我真正的目的。”

不得已只好找军队的交通关系，和他们结伴同行。^①

以上情况表明，范长江到西北考察是两个目的，即他在《记者工作随想》一文中所说：“我自己当年到西北采访，也是怀着两个目的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当时抗战即将开始，抗日战争爆发后，敌人肯定会占领我们的若干大城市，那么我们的后方——西北、西南的情况怎么样呢？这两个问题，也是当时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

二、范长江西北行路线

范长江西北之行，涉足四川、甘肃、陕西、青海、宁夏、内蒙古等省区，行程万余里，历时十个月。如果按其所经地域和采访的路线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成兰之行、陕北之行、祁连山南北之行和贺兰山四边之行。

第一阶段，成兰之行。1935年7月14日，范长江由成都出发，经广汉、绵阳、江油、（中坝）白石铺、大石堡、响岩坝、南坝、古城等地至平武。而后经铁龙铺、水晶站、叶塘、小河营、三舍驿到大雪山下的黄龙寺。7月26日翻越雪山到松潘后，走红桥关、章腊、藏庄昌盘寨一线、越弓杠岭，穿原始森林至戎洞，再经隆康、踏藏、黑河塘到南坪。由南坪继续北进，经野猪关、董上庄、中寨、阳平寨、地尔坎、茶岗寨、哈儿河镇、毛儿坪、南于寨到甘肃的西固县城。接着，走接官亭、宕昌、哈达铺一线至岷县。最后，经西大寨、临潭、陌务寺、隆洼、拉卜楞、河州、锁南坝、漫坪等地，于9月2日到兰州。行程三千余里，旅行时间五十天。这是范长江西北行中，颇为重要的一段行程，他从成都出发的第二天，即了解到红军在中坝时的情况“每日皆开大会，讲演各种事情，故民众皆忙于开会。^②”他还看到了红军在中坝北门外立的上面刻有“平分土地”、“赤化全川”的大石碑。沿途的采访，使他

① 范长江《我的自述》《范长江新闻文集》下卷第1116页。

②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6页。

既了解到了红军方面的情况，同时对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军队情况也有所了解。因此，他到兰州的第三天，9月4日便写出了他西北之行的第一篇通讯《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首次向国统区读者报道了红军长征及分析红军北上的消息。随后，他完成了长达四万字的旅行通讯《成兰纪行》。这次旅行结束后，他被正式吸收为《大公报》记者。

第二阶段，陕北之行。这一阶段，从时间上看，在1935年9月下旬至12月中旬之间。从旅行路线上看，范长江主要往返于兰州、西安及甘陕各地。就其通讯作品来看，是范长江西北行中写作的重要阶级。由于成兰之行，使他了解到有关红军的情况，对红军北上及军事形势作了分析研究，甘陕之行，又为他提供了新的资料。因此，在这段旅途中，他写了不少研究红军北上及有关军事形势的专题通讯，简述如下。

9月下旬，范长江离开兰州，到了甘肃平凉。在这里，他续9月4日所写《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对红军自毛儿盖、黑水沟向北移的形势作了分析后，又就红军主力北上与徐海东由陇东进入陕北的局势作了分析，于9月30日完成通讯《徐海东果为肖克第二乎？》。

10月中旬，范长江到了西安，针对西安社会现状，采写了通讯《长安剪影》。11月2日，他离开西安，径咸阳、邠州、长武，到庆阳，对陕北甘东作了采访。在此，他撰写了《红军之分裂》、《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陕北共魁—刘志丹的生平》、《陕北甘东边境上》等重要通讯。11月13日，他在平凉，又写了《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等文后，转回兰州。

12月13日，范长江乘飞机到天水，在天水、甘谷一带盘桓五天，就进一步了解到的关于松潘之战情况，撰写了通讯《松潘战争之前后》。12月8日，他搭飞机到西安，作短暂采访，10日飞回兰州，紧接着采写了《对于西兰公路之观感》、《兰州印象》等文，